

论近代翻译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何 维,刘祥清^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近代翻译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从中国小说的近代发展历程线索和中外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碰撞与融合,即近代西学翻译的背景来看,近代翻译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影响表现在5个方面:汉语语言的通俗化、创作技巧的革新、功能的嬗变、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创作局面的繁荣。

[关键词] 翻译; 小说; 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6-0121-03

始于1840到1919年的中国近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终结与现代小说开端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从1896年《时务报》译介域外小说到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以林纾、梁启超、周桂笙等人为翻译中间力量,近千部英、法、俄、美、日、德等国的小说被译成中文。数量与规模极为可观,而且远远超过这一时期的创作小说,形成了近代西学翻译的高潮。正是这中外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即近代西学翻译高潮,促进了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一 近代翻译促进了汉语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

纵观中国古代小说,由于受到传统文言的影响,小说叙事的语言大多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有一定的距离。清末民初以前的文言小说自不必说,就连《红楼梦》、《聊斋志异》、《西游记》等也并不是用纯正的白话写成的。有的是文言夹杂白话,书面语色彩非常浓郁,并非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口语^[1]。清末民初的小说家们开始尝试用朴实无华的白话创作且有意识地远离文言。虽然这一时期用极其通俗的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寥寥无几,但文人作家追求通俗已成为一种时代倾向。而《入场券》、《恨海》以及包天笑、周瘦鹃及周桂笙的小说已经算得上是相当标准的白话小说。不可否认,清末民初小说语言的通俗大众化,除了适应梁启超等人试图以通俗的小说来启发民智的需求外,翻译小说的引

入功不可没。由于翻译小说在我国越来越受欢迎,文化不高的读者也要求小说翻译家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他们也能品味别具特色的西方小说。于是白话译的西方小说陆续推出,白话日益受到青睐。在这其中,林纾的翻译对汉语语言的进化有很大的贡献。在林纾的译作中,用的是较通俗、富于弹性的文言,虽然保留了少量浅近的文言词语,但已冲破了传统古文森严的枷锁,在译文中大量运用白话口语(如阿姨、老子等),引用了许多外来语(如蜜月、安琪儿、咖啡、布丁)和一些欧化句法。

二 近代翻译促进了中国小说创作技巧的充实与革新

在近代翻译思潮的引领下,中国小说创作技巧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革新。其主要表现在:

首先,引进倒叙插叙方法。中国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明白晓畅,一般都是由叙事人遵循时间顺序和故事发展的先后串联叙述,很少例外。然而欧美小说却大相径庭,叙事通常从中间开始,有时甚至把情节完全“倒”过来叙述。近代中国一大批翻译家都不谋而合地阐述这种小说叙事方式的亮点。例如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序》中,林纾谈到西方侦探小说偏向于开头叙述杀人者败露,“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2]。梁启超翻译《十五小豪杰》时,也高度赞赏了其“突兀”的开端:“观其一起之突兀,命人坠五里雾中,茫不知其来由,此亦可见泰西文字气魄雄厚处。”^[2]小说家们看到了西方小说倒叙叙事先

[收稿日期] 2012-09-12

[基金项目] 2010年湖南省哲学社科课题项目资助(编号:2010YBB292)

[作者简介] 何维(1989-),女,湖南永州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声夺人的效果,于是纷纷加以模仿,从而拓宽了作品表现的时间与空间,而且还富有层次上的错落与阅读上的新奇感。如在《九命奇冤》中,原本在第16回发生的强徒火攻的场景被移至作品开头,给读者营造了一种强烈的悬念。

其次,引进心理描写。受“说书”的限制,中国传统小说常用语言动作来描绘人物,而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甚少^[3]。而西方小说却惯用细腻入微的笔触直书人物的心理活动,心理描写俯拾皆是。在西洋小说译作的启迪下,小说作家们在创作上做了改变。刘鹗的《老残游记》,描写老残在天山看到冻饿的鸟雀由此联想到曹州百姓连鸟雀都不如的心理。《恨海》描写一位受封建礼教桎梏的未婚少女和在逃难中的张棣华产生爱意却又不得不羞怯避嫌的矛盾内心。《九命奇冤》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在市试发榜时凌贵兴因事先有贿赂但又害怕被他人“夺去”的焦躁、踌躇不安的纠结心态。

再次,引进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纵览小说发展历程,中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的叙事角度。它虽然可以使叙事者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驾驭整个场景,广泛描绘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笔锋能跨越古今,联系过去、贯穿现在和沟通将来,能笔触任何一个人物不足以广泛涉猎的多种境界^[4],但却缺乏生活的真实感。而自从西方小说被译介之后,“新小说”的叙事才慢慢起了变化。许多文人作家尝试运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进行创作,如《毒药案》、《恨海》、《雪鸿泪史》等等。

最后,引进多种题材。中国传统小说的种类比较单调,只有讲史和传奇(包括烟粉、灵怪、公案等)两个类型^[1]。翻译小说的引进,各种小说题材纷纷涌现,有爱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等等。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类型的单调,激发了本国作家的创作灵感,各式各样的小说题材不断涌现,如梁启超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包天笑的科学小说《世界末日记》,包柚斧侦探小说《雌蝶影》,悔学子的教育小说《未来教育史》等。

三 近代翻译促进了中国小说功能的嬗变

中国传统小说主要叙述或“奇”或“怪”、“奇”“怪”交杂的故事,读者在愉悦的气氛中同时接受各种道义及人之常理的劝惩与洗礼。小说大多以忠奸、爱憎、善恶、信诈等说教劝诫。这样使得中国小说情节、人物形象单调呆板,主题狭隘,脱离不了传

统的窠臼,羁绊了中国小说的发展与创新。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不以说教与劝惩为主的小说,如《金瓶梅》、《玉娇梨》、《红楼梦》,它们旨在展示才子佳人的情感故事,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封建的科举、婚姻、等级制度及社会统治思想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因与传统小说劝诫、教诲观念相排斥,在问世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受到世人的重视。随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巴黎茶花女遗事》、《鲁滨逊漂流记》等西洋小说的相继输入,其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使中国小说说教、劝惩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哈葛德、大小仲马、司各特、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以其荡人心腑的小说情节、丰富的人生意蕴深深吸引着中国读者。清末民初小说家们痛感以说教劝惩为目的传统小说的迂腐,纷纷加以讽刺。《官场现形记》真实地暴露了官场的种种丑态;包柚斧的《善良烟鼠》真实地展现了鸦片毒害摧残中国人民的场景;《地方自治》揭露了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阴谋。侧重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各个阶层的动态,描绘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人生风貌。此后,中国小说逐渐由说教劝惩向描绘社会人生及娱乐功能转变。

四 近代翻译促进了中国小说社会地位的提高

中国文学传统素来就视诗文为正宗、为中国文学之上乘^[5]。而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一条细流,被视为“残从小语”、道听途说的“小道”、“海淫海盜”;小说只是世俗社会的消遣娱乐品,难登文学大雅殿堂。从汉代到戊戌变法之前,大雅君子视写小说为不务正业、贱劣行径。他们饭后茶余也可能读读小说,但绝不动笔写小说。随着近代翻译思潮的影响,大量域外小说的输入特别是“林译小说”让中国读者感受到小说是西方文学的主流,是很有价值的文学体裁,小说家们备受人们的尊敬。文人对小说的兴趣不断增加,小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由“小道”上升为文学的主流,“林译小说”功不可没。施蛰存先生就明确提到:“他(林纾)首先把小说的文体提高,从而把小说作为知识分子读物的级别也提高了。”^[6]除此之外,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向西方学习,他们开始意识到要想变法图强、振兴国家,必须开民智、育民德,而小说的推崇正是一种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启迪国民的有效方式。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创办了《新小说》杂志,极力强调小说的社会价值,指出其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更是明确表明:“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7]。正是由于近代翻译小说的输入和梁启超等人的推动,小说迅速地由“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道”

地位转变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大道”地位。

五 近代翻译促进了中国小说创作局面的繁荣

近代域外小说翻译给清末文人和社会大众呈现了外国小说的精彩和巨大的文学成就,孕育、培养了新一代中国小说家,使中国小说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林译小说”贡献颇大。当然,由于林纾本人不懂外语,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译者的水平,小说翻译上误译与改译比较多,甚至还包含个人创作;但在很大意义上,林纾译介的外国小说作品,成为中国小说家借鉴与学习的楷模,更为重要的是它加速了传统小说向现代文学意义上小说的转变。“林译小说”开创了一代翻译文学作品的风气,诱导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倾心于外国文学,塑造了一个崇尚西方文学的新群体——“五四”新文学作家。许多作家都有过读林译小说的经历,并从中汲取营养。新文学革命者在谈到自己最初接触西方文学时,对于“林译小说”都无不给予高度评价。郭沫若说“林译小说中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有决定影响的是他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其中的浪漫主义精神林纾具象地提示给了他,就像“车辙的古道一样,很不容易磨灭”^[8]。胡适说他早年“叙述文学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9]。周作人更是强调晚清文人中林纾对他的影响似乎更大,正是大量阅读林译小说,于是便“引我到西洋文学去了”^[10]。可以说,五四“新文学”作家是沐浴着翻译思潮的雨露成长起来的,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促进了中国小说创作繁荣的新局面。

从近代翻译浪潮中可以看出,翻译之于中国小说,在语言表达、主题思想、写作技巧、社会地位、功能转变和创作局面等方面都有比较积极的影响。除了自身的内部发展动力外,中国小说恰好抓住了近代翻

译思潮带来的新的发展契机,汲取了域外小说的新鲜养分,创造了既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符合世界化趋向的作品,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开创了中国本土小说的创作和发展的新局面。当代翻译工作者和文学创作者应利用翻译来进一步推动中国小说乃至其他形式文学的发展,处理好原创与翻译之间互利互补的关系,保持一个良性的平衡,这也许是我们可以从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得到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王立鹏. 翻译小说促进了中国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变革[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0(4): 31-35.

[2]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1897-1916)[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3] 王炜杰. 晚清翻译文学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影响[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 274-275.

[4] 陈纯尘.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J]. 外国语言文学, 2008(3): 189-192.

[5] 陈洪. 中国小说理论史[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6.

[6] 施蛰存.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M]. 上海:上海书店, 1990.

[7]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 新小说, 1902(1): 1-4.

[8] 郭沫若. 少年时代[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9] 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10] 周作人. 知堂文集·我学国文的经验[M]. 上海:上海天马书店, 1933.

[11] 张萍. 试论翻译对中国通俗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增1): 78-81.

[1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13] 刘祥清. 佛经汉译的历史和作用[J]. 中国科技翻译, 2006(3): 52-55.

Modern Translation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ictions

HE Wei, LIU Xiang-q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s of modern translation up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ictions are very remarka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ctions in modern times as a thread, and the second large-scal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namely,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in modern times as the background,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influences of modern translation up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ictions. The influences are listed as popular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novation of fiction writing skills, change of Chinese fiction's functions, improvement of Chinese fiction's social status and prosperity of Chinese fictions.

Key words: translation; fiction; modern transformation